

文明·秩序·边疆丛书

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

——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

【韩】金容九○著 权赫秀○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明·秩序·边疆丛书

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

——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

【韩】金容九○著 权赫秀○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号 01—2013—43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韩] 金容九著；
权赫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447 - 4

I. ①世… II. ①金…②权… III. ①国际政治—对比研究—东方
国家、西方国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129 号

本书经由金容九先生授权,据세계관충돌의 국제정치학: 동양 禮와 서양公
法一书译出。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夏 侠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的曙光，跨过高山，越过大海，普照了东亚大地，催生了一个包括多个亚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这个文明，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全东亚的，是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在内的共同文化财产。她犹如同根芙蓉，花开数朵，各吐芬芳。

不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有多少的不同，有多少的恩怨，他们依然被认为是生活在“远东”的，用汉字交流、用筷子吃饭的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群。

与超越国家的东亚文明相对应的，是一个以册封一朝贡方式来维持内部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政治运行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体系。它与东亚文明，既血肉相连，又相对独立。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势支配东亚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可以追忆而不可以追回的昨日世界！

而文明却是不朽的。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给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发明创造，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之后，依然生生不息，愈挫弥坚，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青春与活力。

近代，我们历经风雨、苦难、屈辱。现在，我们重新崛起！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我们要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在汲取其他文明营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挖掘传统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为构筑新时代国家间关系和世界秩序提供经验和借鉴。

当然，这审视，不是凄婉低回的告别挽歌，更不是繁华不再的无奈

哀伤，而是重新出发的号角，是再创辉煌的进军令。

本丛书的宗旨是：

放眼东亚世界全局，重构文明秩序边疆。

在一个需要走出传统国家意识的时代，在一个更多地需要地区协作和全人类面对共同难题的时代，未雨绸缪，立足于文化的自省和自觉，温故知新，编辑出版有关东亚文明生成、亚文明间关系、内部运行机制、秩序观念和相互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反省精神，更为冷静、理性的学术努力，超越近代国家绝对化的藩篱，还原东亚文明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本丛书出版的目的与期望。

相信走过了超国家“天下”时代的中国，在新的超国家的全球化时代，能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智慧。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一直试图诠释东亚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且有了不少的成果积累。但是，其中的不少人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之下，不但把该研究放在欧美进步、东亚落后的窠臼里，而且认为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种种变化，也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已，故存在很多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解。这些不只是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也常常让人觉得背离了东亚文明的历史真实。

近些年来研究，推出了“中国中心观”，试图找寻中国或者东亚世界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中国中心观”不是“中国正统观”，是强调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不是强调中国的正统地位。东亚文明只是一个区域性文明，一个仅仅限于东亚的“世界”体系。未来的全球化，不是古代东亚秩序体系的放大，更不会整合到中国的“天下”之中。

历史上，不只是中国的王朝喜欢自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诸如朝鲜、日本、越南的王朝或政权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抱有“小中华”意识，认为自己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人类群体交流相对隔绝的时代和区域，这种“夜郎”现象都曾经存在过，只不过是“夜郎”大小的不同。而且，作为地区性中心，这种所谓的“自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不同的

角度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历史上，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一致的情况经常出现。而且，不管是文化的边疆还是政治的边疆，也不全是被动的存在，其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更需要个案研究，我们期待大视角、全方位到创新研究成果问世。

本着“编委会从简，丛书质量从优”的原则，本丛书不另设编辑委员会，由三人合作编辑：

高士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问题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曹宏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台湾史研究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科研处长。

三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但都对东亚文明及其政治秩序原理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议决定共同承担这套丛书的企划、编辑和出版。我们将首先推出比较有影响的海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同时，也尽最大努力给国内研究者提供展示学术成果的舞台，与其他文明比较的著作也在欢迎之列，期望借此促成诞生我们自己的文明研究学派和边疆研究学派。

任重，道也远，我们愿与广大有志者一起，为提高东亚文明研究的学术水平而努力。

高士华 谨识

2013年10月10日

中文版序

出版于1997年的拙著能够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而以中文版再度面世，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自从90年代中叶临近首尔大学外交学科教授的退休年龄以来，笔者开始陆续出版有关平生为之钻研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著作，此次翻译出版的《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便是其中的一部。迄今而视，早在十五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显然存在着不少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然而该书却也是最早具体地揭示了著者如下的基本观点：

第一，欲了解强大国家之国际政治学的本质，首先应当从比较文明圈的视角去加以考察。这样一种观点的基本前提就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19世纪以来西欧及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其实不过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

第二，举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文明圈的存在方式，都是取决于其场所（*topos*）与时间（*tempo*）。此处的场所，是指维系该文明圈的名分所认为适宜的空间，如东洋的“天下”、欧洲的“世界”（*oecumene/oikoumene*）、伊斯兰的“伊斯兰之境”（*dar - al - islam*）等。至于时间，则是指关于特定文明圈之行为者的特性及其作为与不作为的规范内容，乃至对文明圈共同敌人的认识所存续的历史时间。

第三，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圈内部，中心势力都在寻求构建帝国，而其周边势力则具有强调独立性的倾向。著者在包括本书在内的相关著作中，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周边对帝国扩张的对应过程，因为这样一种视角对于了解朝鲜的历史地位能够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第四，借用现代的词语，就是应当关注到历史上曾经存在帝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与独立的国际政治理论。其最近的事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支持“世界国家”美国之国际政治立场的所谓“美国式国际政治学理论”一度风靡全世界。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行为主义方法论为首的各种理论被粉饰为能够超越各种“场所”及“时间”的所谓“普遍理论”而广为传播，当时英国、苏联、法国、荷兰等国的学者们则对这样一种倾向进行了抵制。这些周边国家的理论动向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五，以上就是著者在相关著作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当然，不应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要深入了解各个文明圈所具有的精神结构性特征以及各文明圈内部中心与周边的冲突结构，还要进一步去考察各文明圈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对于考察19世纪以来东北亚国际政治秩序本质的研究而言，上述视角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在韩国研究财团为期十年的资助计划之下，著者从2007年起与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的三十多名研究员一起致力于“东北亚概念的相互沟通研究”，理由也在于此。

韩国学界有关韩中关系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权赫秀教授在韩中两国学界相继发表的有关韩中关系史的论著与资料，显然是一系列高水准的优秀研究成果。正是通过有关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的研究，著者与权赫秀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此次承权教授不辞劳苦将拙著译介到中国学界，更是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夏侠编辑为拙著的翻译出版付出了许多辛苦，在此一并致谢！

金容九撰于韩国翰林大学研究室

2012年12月

“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①

本书之所以抛开通常使用的“外交史”一词而改用“国际关系史”一词，自有其相应的理由。在传统上，外交史一直被狭义地理解为大使之间的交涉史。对此，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应当考虑到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从而开始提倡建立一种国际关系史。当然，关于上述诸多因素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国家之间的交涉，迄今仍有争论，因此主张继续使用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史的观点，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至于笔者所采用的国际关系史一词，却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史研究应当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的一个简单理由。大使之交涉史意义上的外交史，本质上是以欧洲国际社会为背景而出现的，而大使们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行为者即所谓近代国家则是欧洲社会的产物。然而，从历史上来看，曾经存在过各种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社会行为者。

至于构成所谓“国际社会”的条件究竟应该包括哪些，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且还根据是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而区分为“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关于如何区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与“文明圈”、“文化圈”、“圈域”等，也是众说纷纭。我认为，只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就能认定形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国际社会：（1）关于基本单位或行为者应是怎样一种的基本共识；（2）关于行为者之作为及

^① 译者注：原文作“关于比较国际关系史研究丛书”，此处则依著者意见而改用此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著者就提出了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撰写十部世界外交史系列著作的构想，1997年相继出版的《跳舞的会议：维也纳会议外交》以及本书便是上述十部系列著作的最早两部，而著者正是通过该发刊词宣布了撰写十部系列著作的构想。

不作为的道德、政治及法律层面的最基本限度的共识；（3）保持对其他国际社会的共同认识等。

如此看来，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形态的国际社会，在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也曾存在过其内部各行为者之间所特有的相互关系史。比较考察这些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究竟是哪些原因与因素导致了这些不同形态国际社会的兴亡盛衰以及稳定与危机？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相互接触或冲突，又会导致怎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就是在阐明我们当今所生活的国际社会的历史性。

至于我要撰写有关比较国际关系史的十部系列著作，却并不仅仅是出于上述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和喜欢，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际社会毕竟是大约自 15 世纪以来开始向世界扩张的西欧社会之全球性扩散的结果。因此，从非西欧社会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非自生的结果，而被编入和接受到这样一种国际社会本身，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开始，在学术上则是依附的开端。尽管如此，韩国学界的风气仍是忘却了这样的历史性本质，而毫无批判地接受和传播美国及欧洲的政治学，甚至执着于一些枝叶末端的纯学术性问题，从而沦落为一种知识上的工匠。

如今，已经面临一个需要将我们的问题放到一个长远的历史脉络来加以考察的重要时期。我们应当去思考究竟什么是所谓后现代时代的历史性，而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形态？更为迫切的是，我们要思考在未来的国际社会，韩国应当处于怎样一种地位？问题在于，只有通过长期的深入沉潜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才能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我之所以要撰著比较国际关系史研究系列著作，只不过是想要为这样一种基础性学术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前言

我们如今生活在信息的泛滥之中，即便是一个通常的项目，也会有数百甚至数千条相关信息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久前曾经在互联网上检索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仅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目录就达到了A4纸近五十页。将如此众多的信息往来称之为先进化或世界化，其实不过是一种儿戏，因为信息太多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信息。问题就在于究竟有没有能够选择与识别这些信息的能力。只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和判断国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学本质上属于强大国家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他们自我宣传的成分，因此要注意到国际政治的这种属性。

正因为如此，学问的独立性就成为一个问题。有关一种学问的事实总是要先行存在于该学问本身，国际政治的现实当然也要先于国际政治学而存在。由于国际政治学基本上属于强大国家的学问，因此如果想形成独自的国际政治学，就首先要跻身于强大国家之列。正因为如此，在非强大国家的地区，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这样的“国际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属性”。法国学界一度将“政治学”一词写做斜体的“*science-politique*”，以表示它实际上是美国的学问，而英国的一些学者作为对抗美国式国际政治学的一种方法，也曾提倡“比较国际社会论”。至于苏联学界，则在“国际政治学”一词的前面总是要加上形容词“资产阶级的”。本书就是发端于上述的问题意识。

那么，为什么在事过百年之后还要来谈论19世纪的问题？就是因为19世纪当时最早接触西方的学问并开始学界冲突和苦恼的那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考察西方的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法是在何时以及如何传入中国与朝鲜，而且是如何被接受甚至出现

了曲折。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我国的国际政治现实，至今仍未能克服19世纪时就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19世纪与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便是我国的实情。换言之，我们的身边同时存在着统一、冷战以及后冷战的问题。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经得到了周围许多人的帮助。感谢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的郑宇燮硕士和南基正硕士，还要感谢国立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班的文有美、郑容和、金显哲、郑廷民诸君以及研究生院助教室的姜命九硕士、金范洙，还有硕士生金成坤、姜东局、文圣恩、郑善和、黄顺健、都钟允诸君。

尽管基础学问领域的研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总是得不到重视，罗南出版社的赵相浩社长却总是鼓励我在“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中宣布撰著十本著作的计划，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罗南出版社的编辑部成员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圆满地编辑出版了我的新作《跳舞的会议》，本书的出版还是承他们的辛苦，因此要再度感谢编辑部的方纯瑛部长、李毕淑次长以及赵秀任小姐。

1997年9月

著者谨识于星轺研斋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欧洲公法的本质	(5)
一 罗马法与万民法	(5)
1. 外国执政官	(5)
2. 盖厄斯	(6)
3. 乌庇安	(7)
二 中世纪与万民法	(8)
1. 伊西多尔	(8)
2. 格拉丁、巴托路斯、阿奎纳斯	(9)
三 国际法的英雄时代与万民法	(10)
1. 维多利亚	(10)
2. 苏亚利兹	(11)
3. 格老秀斯	(12)
4. 苏支	(15)
5. <i>jus gentium, droit des gens, international law</i>	(16)
6. 17—18 世纪欧洲公法的特征	(17)
四 19 世纪欧洲公法的本质	(18)
1. 实在法主义	(18)
2. 欧洲中心主义	(21)
3. 欧洲扩张主义	(22)
4. 惠顿	(23)
5. 马顿斯	(28)

2 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

- 6. 伍尔锡 (29)
- 7. 伯伦智理 (30)

第二章 事大秩序 (33)

一 中国古典与天下 (33)

- 1. 儒教圈的国际秩序 (33)
- 2. 华夷之区别 (34)
- 3. 天下秩序观 (36)
- 4. 事大秩序观 (37)
- 5. 朝覲与聘问 (39)

二 明清年间的事大秩序 (40)

- 1. 事大秩序的形成时期 (40)
- 2. 明朝时期的事大秩序 (41)
- 3. 清朝与事大秩序 (44)
- 4. 广东贸易制度 (45)
- 5. 朝贡秩序的瓦解 (46)
- 表一 明朝时期朝贡国家及其朝贡年度 (48)
- 表二 清朝时期朝贡国家及其朝贡次数 (52)

第三章 欧洲公法传入中国 (54)

一 东西方的早期接触与西洋公法 (54)

- 1. 耶稣会神甫与《尼布楚条约》 (54)
- 2. 林则徐与瓦特尔 (57)

二 丁韪良与西洋公法 (60)

- 1. 翻译西洋国际法著作 (60)
- 2. 丁韪良翻译中的问题 (64)
- 3. 丁韪良有关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 (65)

三 洋务运动与西欧公法 (66)

- 1. 郭嵩焘 (66)
- 2. 薛福成 (68)
- 3. 郑观应 (71)

4. 马建忠	(79)
四 变法派、革命派与欧洲公法	(83)
1. 康有为	(83)
2. 胡汉民	(86)
第四章 朝鲜与西洋公法	(88)
一 与异质文化圈的接触与西洋公法的传入	(88)
1. 有关传入时期的问题	(88)
2. 作为用语的“万国公法”	(91)
3. 西洋公法的早期传入	(92)
二 两种世界观的冲突	(96)
1. 李裕元与李鸿章	(96)
2. 《朝鲜策略》与《易言》	(99)
3. 对西洋公法传入的批判	(102)
三 壬午军乱与西洋公法	(105)
1. 朝鲜与西洋公法体系	(105)
2. 接受西洋公法	(108)
3. 被纳入到公法体系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109)
4. 《汉城旬报》《汉城周报》与万国公法	(112)
四 “两截体制”与西洋公法	(116)
1. 甲申政变	(116)
2. 巨文岛事件与欧洲公法的本质	(119)
3. 俞吉浚	(124)
4. 朴泳孝	(134)
五 对西洋公法的援用与怀疑	(138)
1. 乙未事变与称帝建元	(138)
2. 西洋公法与条约论	(142)
3. 公法的虚与实	(144)
结论	(148)

4 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

参考文献 (152)

词汇简表 (169)

译后记 (174)

绪 论

从中国或朝鲜的立场来看，本书是关于中华与夷狄之冲突的研究，如果从西方的立场来看，则是关于文明与野蛮之对立的研究。借用湛轩洪大容的表述，则可以说是试图揭示“春秋”与“域外春秋”所持有的名分世界^①。

关于本书书名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必要进行一番说明。首先，“世界观”一词是指特定的政治—社会集团内部的个人、阶层或阶级对外部世界所持有的认识态度，是1950年以来一度盛行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际，随着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②的著作出版，这一概念也曾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广为流行。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想从另一层意义上使用“世界观”一词。早在“比较国际关系史丛书发刊词”中，我已经指出根据历史时期及场所（topos）的不同，曾经存在过不同形态的国际社会，而且在说明一个特定的国际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之际，也曾指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① 洪大容（1731—1783）的如下表述颇有启迪意义，试看其原文：“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猾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湛轩书》I，第92页）洪大容认为如果孔子生活在夷狄的世界，就会根据那个夷狄世界的名分来编写历史。由此可见，洪大容已经承认夷狄世界的正当性，并且似乎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也可以存在除中国之外的另一种国际政治秩序。不仅如此，他在上引原文之前的部分还阐释了著名的“华夷一也”命题，主张要克服所谓华夷思想。

译者注：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号湛轩，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实学家，曾经作为朝贡使行的书状官出使清朝首都北京，著有《湛轩记》《干净笔谈》《医山问答》《刘鲍问答》《湛轩燕记》《林下经纶》等。

② 译者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时代诊断》《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